

最受欢迎的演说家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因为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抗日主张,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蜂拥而至。

知识青年汇集延安,都希望听听共产党关于抗日救国的具体主张。中共对于参差不齐的各地学生,也有意将对他们的教育从课堂拓展到广场。毛泽东无疑是最受欢迎、也最辛苦的“演说家”。他经常在延安陕北公学的操场上摆一张小桌子,对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新招的学生演说。

毛泽东讲得比较多的就是抗战形势:为什么只能选择持久战,为什么当前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我们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毛泽东讲话善用比喻,常将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又妙趣横生。学生们听到高兴处就鼓掌,听到谐趣处就大笑。学生笑,毛泽东自己也跟着笑,讲完后还同围着他的学生边走边聊,也不急着骑马返回。

毛泽东的演说也有怒发冲冠的时候。1939年6月12日,蒋介石密令杨森部突袭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杀害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徐正坤等6人,制造了“平江惨案”。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平江惨案”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即席

抗战时期

延安慷慨激昂的演说现场

·冉思尧·

发表了《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演讲。毛泽东在晚风里挥舞着手势,大声怒斥国民党的罪行。听众们群情激昂,口号震天响。因为陕北昼夜温差大,有些初来乍到的外地学生边听边跺脚取暖。时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的许光达让跺脚的学生保持安静。毛泽东反倒体谅学生:“天这么冷,为什么不让跺脚!”他这样一说,大家反而安静了。

“抓丁”演说与“挂牌”演说

费尽千辛万苦来到延安的,还有很多知名人士或高级知识分子。学生们上街,只要发现了一位知名的人,就要求现场讲话。因此,“抓丁”演说也是当时延安街头的特色。

1936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书记徐懋庸因“左联”解散、“两个口号”论争等问题苛责鲁迅,后者写下著名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后去世,就此留下一段公案。徐懋庸到延安后,学生们纷纷请他现场讲其与鲁迅之间的是是非非。徐懋庸表示很愿意就此话题讲演一番,但他不知道



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同学听毛泽东讲团结抗战问题

鲁迅先生同不同意,便掏出一枚铜板,说:“我把铜板抛上去,铜板着地时字朝上,表示鲁迅先生同意我讲,我就讲;铜板着地字朝下,便是鲁迅先生不同意我讲,我就不讲。”没想到真的字朝上,徐懋庸也就滔滔不绝讲开了。

“挂牌”演说是延安的又一特色。陕北公学校部前面有片广场,每逢周末学生常在此自由聚谈或寻亲访友。这里稀稀拉拉长着几棵小树,上面贴满了各种纸条,有寻人启事、结社通知,也有演讲海报。海报上的演讲人基本都是大家熟悉的,要讲的问题也是青年所关心的,所以听讲的人也很多。

时任陕北公学校长的成仿吾,就常在此地“挂牌”演

讲。成仿吾是曾和鲁迅激烈论争过的著名文人,又是共产党员,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学生大都对他怀有好奇和敬意,常聚集起来听他讲其与鲁迅等的笔战,以及长征中的经历。成仿吾也借机宣传介绍陕公的办学宗旨、教学内容及方法。

演说现场的无名英雄

一场精彩的演说就是一席丰盛的精神盛宴。速记员的无私奉献才使演说时的吉光片羽化为严整的鸿篇巨制。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并没有速记工作机构,也无速记人员。战争年代领导人讲话很少专门拟稿,往往只有一个提纲。如1942年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做整风报告,提纲就很简单,主要是即兴发挥。其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反对党八股》,提纲也仅两页纸,上列八个标题。党的速记工作是借鉴苏联经验后,从延安开始的。

1938年4月,第一期中央速记训练班在延安成立。第一期学员是从抗大和陕公毕业生中挑选的20名共产党员或具备人

党条件的年轻人,男女各半,身体好反应快,年龄在20岁左右。1938年8月,第一批学员结业,随即被分到中央、边区几个重要部门工作。

速记工作默默无闻又异常辛苦。中央密集地召开重要会议时,与会者往往乡音各异,又是自由发言。速记人员对有的方言听不太懂,又不熟悉发言人所说的属地情况,记录难度极大。一般白天记录一小时,晚上就要翻译三小时,还要复写出来,工作十分紧张。中央对速记员要求很严,但在政策待遇上对他们关爱有加,速记员若是晚上加班,必定安排夜宵,边区最困难的时候,还给他们每人每月另发六斤小米津贴。

中央领导人厚爱这批无名英雄。贺龙曾为速记员的棉鞋特批过条子,刘少奇亲自给速记员送过西瓜。毛泽东经常交代李富春,说要让速记员吃好睡够,好有充沛的精力做速记。毛泽东本人作完报告,还常把做速记的年轻人拉上他的卡车,开到合作社请他们吃一顿。有时候开完会有供应的伙食,毛泽东就把自己的那份菜分给速记员。后来速记员们一见毛泽东端着盘子过来,就赶紧捂住自己的碗,怕又给他们夹菜。(摘自《文史天地》2022年第7期)

新冠疫情令世界经济步履维艰,不少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历史上,疫情之后出现的经济危机屡见不鲜。

万亿德国马克换一片面包

上世纪20年代的德国,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疫情叠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恶果,让100年前的德国人经历了一场噩梦般的恶性通货膨胀。

1914年一战打响时,德国政府采取了发行战争债券的方式,将自己的货币马克与黄金脱钩。德国政府为了应对战争开支不断加印马克纸币,为后来的苦难埋下伏笔。1918年,德国人输掉了战争的豪赌。到1921年,德国的经济开始崩盘,德国货币马克开始了“自由落体式”的贬值。

据记载,在1914年7月,美元与马克的汇率约为1:4。到1918年战争结束时,美元与马克的汇率到了约1:14。但在1923年10月份,1美元可以兑换的马克数值为253亿,而仅一个月后的11月,这个数值达到巅峰,1美元兑换4.2万亿德国马克。

在此期间,德国300多家造纸厂和20多家印刷厂每天24小时不停开工,为国家银行提供所需的钞票。到了后期,印刷厂已经赶不及制作模板在钞票上印那么多的零,而改为直接在1000马克的钞票上盖章,证明它变成了10亿马克面值的纸币。



通货膨胀最严重的阶段,德国儿童用钞票搭积木玩

通货膨胀最严重的阶段,有人描述当时的场景:工人们的妻子在厂子门口推着小车等待发薪,一领到成捆的钱,她们推车一溜小跑直奔食品店,购买面包和生活必需品,一刻也不敢耽搁。因为很可能“上午买面包的钱,下午连面包渣也买不起了”。上万亿的马克,真的只能换一片面包了。

恶性通货膨胀给德国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1923年底,有着金融天才之称的沙赫特临危受命出任德意志银行总裁。沙赫特上任后立刻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寻求外国金融资本的支持,二是进行货币改革。沙赫特大量引入美国资本,与美、英、法等国就战争赔款问题进行磋商,达成共识,要想从德国获得战争赔款首先必须确保德国经济不至于崩盘。另一方面,德国用国

三次惊世大通胀

·张继文·

有土地和房屋作为抵押,发行新的“租赁马克”取代极度滥发的旧马克,新、旧马克的兑换比率定为1:1万亿。

通过一系列操作,德国的经济逐步得以恢复。但同时,德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深。

匈牙利曾创通胀世界纪录

有记录称,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是二战后的匈牙利。1946年匈牙利发行过金融史上面额最大的钞票,“1”后面有20个“0”,但神奇的是这张钞票拿在手上却看不到“0”。

匈牙利的通货膨胀源于战乱。两次世界大战,匈牙利都追随德国成为战败国。一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匈牙利被迫接受《特里亚农条约》,其国土的70%多被瓜分,人口也从2000多万锐减到600多万。在此背景下,匈牙利的经济开始艰难恢复。

但好景不长,没过几年好日子的匈牙利人又被德国裹挟着投入了二战。战败后,面对空空如也的国库和几近于无的税收,匈牙利政府除了加印钞票似乎别无他法。据美国卡托研究所的数据,当时匈牙利的通货膨胀率也达到人类有史以来最高值,为百分之1.36万万亿。用美元汇率更能说明问

题,二战前的1941年,1美元约可以兑换5帕戈。到了1946年3月,美元与帕戈的汇率到了1:175万,4月上升为1:590亿,5月为42万亿,7月到达巅峰,460万亿帕戈才可以兑换1美元。

极度的贬值让匈牙利印钞票的专用纸都快告罄了。无奈之下,匈牙利在货币单位上玩起了文字游戏,将最小币值单位从1帕戈直接变为百万帕戈,后来又出现了万亿帕戈为单位的钞票。而且,不同“币值”的钞票使用不同颜色印刷,百万帕戈的钞票为紫色,万亿帕戈的为蓝色。人们买个鸡蛋都要花上几万亿帕戈。

1946年匈牙利发行的一垓帕戈的纸币(垓:10的20次方),也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面值的钞票。这种一垓帕戈的钞票,后来还成了一些钱币爱好者的收藏。恶性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期,许多匈牙利城市的人干脆不用纸币,直接拿着手头有用的物品到农村去换粮食,开启了“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模式。最后,匈牙利政府无奈在1946年8月以新货币“福林”替代帕戈。

阿根廷“失去的十年”

据记载,1989年阿根廷通货膨胀率达到5000%,1990年更是达到其历史新高——

20000%。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阿根廷自1975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的通胀率都在300%以上。到了1985年,阿根廷政府无奈废除了旧货币比索,发行新货币奥斯特,但奥斯特也难以抵挡贬值大趋势,甚至在1990年前后爆出超高通胀率。阿根廷只得在1992年又将货币改回了比索。因为高通胀和经济危机,许多阿根廷中产阶级在上世纪80年代又陷入贫困,因此那个年代也被称为阿根廷人“失去的十年”。

历史上的阿根廷曾经也是非常有钱。19世纪至20世纪初,其经济增长率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水平甚至超过当时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当时流传着一种说法,如果在欧洲想要形容一个人有钱,人们会说他“富得像阿根廷人”。但后来,阿根廷却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从发达国家“跌落”回发展中国家经济体。

究其原因,既有外因也有内因。1914年,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称得上是一个外因,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此失去了国际重要贸易港口的地位,阿根廷在国际经济体系中逐渐被边缘化。阿根廷农牧业资源得天独厚,然而,阿根廷过于依靠这种优势,没能抓住机会及时完善自己的工业体系。此外,阿根廷20世纪比较动荡的政治局势,也未能给经济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摘自1月4日《环球时报》)